

杜薇 著

百苗图汇考

本书是认知和把握二百年前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关键。本书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验证了历代典籍，查证了民族文化递变的脉络，铭铸各家之说，创「百苗图」研究一家之说。

文化调适、族际互动造就了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并格局，令人目不暇接，而本书条分缕析，形象具体地揭示了文化事实的来龙去脉，探求了「百苗图」原作者的编排体例，展示了原作者的认知成果，使今人如见二百年前的贵州各民族文化实况，为历史人类学的文化复原研究完成了一个范例。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孔燕君

封面设计 王 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苗图汇考 / 杜薇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12

(百苗图研究丛书 / 杨庭硕主编)

ISBN 7-5412-1044-7

I. 百... II. 杜... III. 百苗图-研究
IV. 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2607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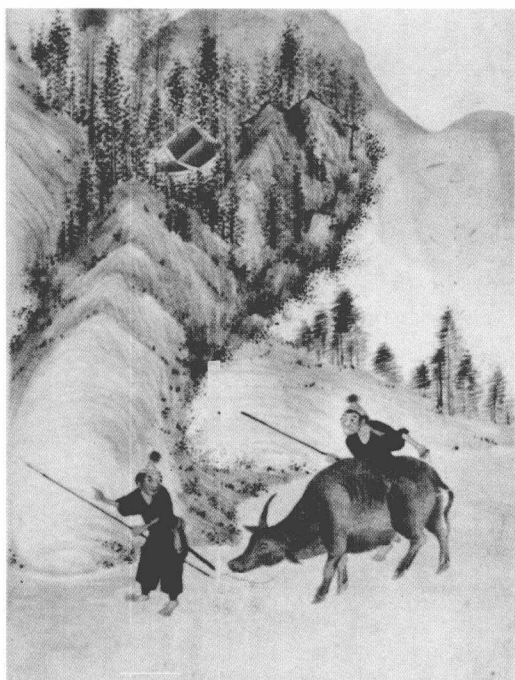
贵阳宝莲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mm 1/32 印张:9.875 插页:4 字数:25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28.00 元

刘雍藏《柒拾
貳苗全图》第七十
七图“黑楼苗”



白獬獬

亦在大定及安順有之与黑獬獬同而為下姓如毛
飲血無論鼠雀蠅蠕動之物攫而燐之飲食無盤盂
以三足釜攢食如死人死以牛馬皮革裹而焚之居菩
定者名阿和同此類



刘雍藏《黔苗图说四十幅》第三图“白保僇”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藏《百苗图咏》第七十八图“短裙苗”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藏《百苗图咏》第四十二图“谷苗”



贵州省博物馆藏《黔苗图说》第二十一图“打牙佬”



贵州省博物馆藏《黔苗图说》第三十二图“土人”



台湾影印版《番苗画册》
第十一图“锅圈佬佬”



台湾影印版《番苗画册》
第十二图“花佬佬”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百苗图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 方 铁

顾 问 李廷贵 冯祖贻

主 编 杨庭硕

副主编 刘 锋

编 委 潘盛之 刘 雍 曾宪阳

李黔滨 姬安龙 陈 琳

杜 薇 吴正彪 李汉林

孔燕君

总 序

宗蜀华

“百苗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百苗图”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其珍贵之处有三：一、它是可以明确断代而又自成系统的贵州民族志典籍；二、它是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信息荷载极其丰富；三、它是出自原作者陈浩的亲身调查，所载资料准确可靠。然而由于“百苗图”附有彩绘插图，批量刻版流播极其困难，故一直是以临摹抄本传世，时至今日，国内外公私所藏抄本多达百余种。不仅各抄本之间相互抵牾，而且不管哪个抄本，都有大量错讹、脱衍，以致研究者无所适从。为使这套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原貌得以恢复，全面地发挥其资料价值，立足于现有抄本，进行抢救性研究、整理，实属刻不容缓。然而，由于历史民族志整理难度极大，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望而生畏，以致这一研究工作被长期搁置下来。

杨庭硕教授组织了研究小组，不避艰难，历时六年，完成了“百苗图”的研究整理任务，从中总结出一整套校释历史民族志的规范和体例，既填补了研究、整理“百苗图”的空缺，又对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思路，使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该小组

倡导的多学科相结合的校释方法,对类似文献的研究、整理做出了有益的示范,对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研究整理汉文历史民族志典籍,是一件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它除了面对古籍整理中的各种困难外,还需要克服六重障碍,才能获得令当代满意,又能传诸后世的成果来。

流传至今的汉文历史民族志典籍,成书于前人之手,又几经传抄改版,不同时代的经手人,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凭借自己的阅历和学养,对这些典籍进行不断的再创造。前人的思想立场,显然与今世迥然不同,表现在历史民族志编写传抄中,总不免要把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東西混入其中。对这些不健康的東西,在缺乏旁证资料的情况下,既难以识别,更难以剔除。今天的研究者若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万难分清混杂于一体的精华与糟粕,此其一。

历史民族志典籍中,各民族用语俯拾皆是,进入典籍的形式也千差万别,有的是音译,有的是意译,有的是音译兼意译,有的是通过中介语转译,不一而足。要弄清它们的翻译转写形式就更是难上加难,要作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汉语史的素养,还需要掌握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流变轨迹。遗憾的是,时下语言学界对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流变掌握得不够充分,完成此项研究任务的学术基础极其薄弱。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逐一弄清历史民族志典籍中的各民族语词,考订其读音、含义、流通时限、使用范围及译写形式,确实是一项极其艰苦又难于见成效的研究任务。研究者若无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相关各民族语言的素养,万难成事,此其二。

典籍整理必然要碰到地名沿革问题,但这一繁难问题在历史民族志整理中,还会派生出新的障碍,这是因为历史民族志中涉及到的地名,不少是仅见于一例,最多不过二三例,地名的传承沿革变易,旁证资料十分缺乏,难于弄清沿革变易的线索。单就贵州而言,被称作龙里者不下五处,被称为凯里者不下七处,被称作清水江的河流就有三处。这些地名所指代的地望往往相去数百里乃至千里。要想逐一弄清典籍中出现的地名到底指何地,即使是对沿革地理极为熟悉的地名沿革学家,也不免望而生畏。要作好这项工作,除了要遵循地名沿革考订的一般准则外,研究者还必须拿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逐一对比各地地名的古今差异、民族差异、文白差异及行政建制变迁,因而光靠查典籍万难成事。研究者若不具有深厚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功底和实践,也无法完成此项研究任务,此其三。

整理其他汉文典籍,当然也会碰到文化事项诠释,但那仅属于古今文化事项的流变诠释,其流变的线索极为分明,诠释难度并不大。整理历史民族志典籍则大不一样,由于这类典籍提到的文化事项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流行于什么时代和范围,往往缺乏足够的旁证资料,而且流变脉络纠缠不清,加之典籍的原作者和传抄者又常常仅就偶然的一得之见敷衍成文,考订起来倍感佐证资料贫乏。举例说,在“百苗图”原本中光是“不落夫家”婚习就有五种表述办法,涉及到布依族、侗族、壮族、苗族、水族等五个民族,若不借助民族学的相关理论,终不免在不自觉中张冠李戴或人云亦云,要想跳出民族本位偏见的窠臼,研究者全面把握当代民族学的前沿理论,实属必不可少,此其四。

历史民族志的原作者和传抄者对汉文典籍太熟悉了,以致在编写和传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要用汉族文化事项去比附其他民族和杜撰相关民族的文化事项,以致流传至今的不少历史民族志典籍中,普遍存在着从汉文化角度看,逻辑严密,描写精当,但从相关民族的角度看却于理不通的实例。以“百苗图”为例,该书的“九股苗”条对苗族甲冑和“偏架”(一种巨型弩机)的描写和附图就大成问题。按照书中的描写,这样的甲冑穿上后根本不能活动自如,而且,如此巨型的弩机,也难以用于两军正面对垒,只能充作伏击用的武器和猎具。要对此类描写作出正确的校勘、整理和诠释,若无工艺制作和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必然会在研究整理中以盲导盲。研究者要获得工艺制作和科学技术的相关知识,不仅要熟悉当代科学技术现状,还需对科学技术史有较深的了解,此其五。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间总是不断地互相影响,文化事项交错互动和渗透,致使同一文化思想可能在不同民族中以不同形式并行存在,而历史民族志的作者和传抄者的个人阅历有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凭借个人偶然所见成文,致使流传至今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其涉及到的文化事项往往源流难辨。要研究整理好历史民族志典籍,就得对典籍涉及到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充分的了解,能从文化事项发展的角度,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逻辑理出个系统来。为此,研究者和整理者不仅要熟悉典籍,还得熟悉当代的相关民族研究成果;既要作跨越古今的了解,又得找出沟通古今的途径和办法,这就难乎其难了。“百苗图”中有关苗族的葬习就多处提到,但不管哪一处,其所属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几乎风马牛不相及,若不从苗

族固有的生死观出发,就万难将该书中提到的“树葬”、“崖葬”和“悬棺葬”、“停柩待葬”、“洗骨葬”、“二次葬”、“缚肢葬”整合起来,弄清它们全是从“风葬”流变而成的演化形式,并以此将它们与彝族的“火葬”、百越各族的“厝置葬”区分开来,进而弄清这些民族间如何相互影响,诱发为各民族具体的葬习演化。因此,必须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去梳理历史民族志典籍中提到的文化事实,乃是历史民族志研究的第六大难题。

杨庭硕教授主编的“百苗图研究丛书”,在上述六个方面都作了大量工作,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尽管前面的研究道路还很长,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时当“西部大开发”次第推进之际,百废待兴,历史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理当紧紧跟上,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现在贵州特别选择“百苗图”作为历史民族志整理的突破口,其热诚和已取得的成效,实属可喜可贺。此项研究的成功,不仅为民族学界、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可靠的“百苗图”善本和准确的“百苗图”注本,还以此为契机系统地梳理了贵州历代民族志典籍,为贵州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因而,该丛书的出版是对历史民族学的一大贡献。相信该丛书所作的奠基性工作,必然会引出国内外类似丛书的出版,蔚然成风,从而,将历史民族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谨此为序。

2001年3月3日

序

方 铁

“百苗图”原本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它是一部有明确断代依据的私家著述。“百苗图”原本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19世纪贵州众多民族生产、生活的实况。它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文字记载虽说十分简略，但所附插图却荷载着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对我们今天探讨贵州各民族19世纪初生产、生活方面的状况，具有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百苗图”原本面世以后，认识到“百苗图”的价值并有心从事整理研究者为数不少，但终因工作难度太大，传世抄本的收藏过于分散，且残缺不全，因而真心把这项工作坚持到底者寥寥可数。以杨庭硕、刘锋、李汉林、杜薇诸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小组，矢志不渝，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这部珍贵的民族志专著。他们的整理和研究历时七年，在出版李汉林的《百苗图校释》和刘锋的《百苗图疏证》之后，又推出了杜薇的《百苗图汇考》。至此，对“百苗图”原文文本的研究算是告一个段落。杨庭硕、刘锋、李汉林、杜薇诸学者，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他们所从事的对“百苗图”的系列研

究,既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又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重点支持的研究项目。在《百苗图校释》和《百苗图疏证》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现在又推出杜薇的《百苗图汇考》,欣喜之余,特作此序,以表祝贺。

“百苗图”的编排体例,沿袭的是我国古代民族志编排的老传统,以条目内容为经,条目编排作纬,去展示特定时代的区域性民族文化状况。长期以来,不少读者未注意到这一特点,利用这份珍贵典籍时,仅孤立地关注各条目所载的具体内容,忽略了条目编排体例的资料价值,同时也忽略了条目内容与附图的关系。《百苗图汇考》正是针对这一偏颇而作。

《百苗图汇考》通过对“百苗图”编排体例的传承及变迁的综合分析,并辅以条目名称所蕴含的民族支系、亚支系乃至地方群体的考订,利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基本上复原了原作者的编排意图,从而使原本隐而不显的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得以破译。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为历史人类学恢复共时态文化原貌作出了成功的尝试。同样,由于体例的关系,“百苗图”各条目所载内容意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却忽略了在共时态状况下并存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中还有相互可通之处。《百苗图汇考》借助大量的横向对比,澄清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辩证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百苗图”所揭示的19世纪贵州各民族文化作了跨时空的反观,同样证明了历史上并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异同辩证关系。该书对19世纪初贵州各民族婚习、葬习、工艺制作、社会组织等内容进行了专考,无一不贯穿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路。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借助历史文献,

再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消失的民族文化事实,但不少人仅以民族个体为单元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忽略了区域性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百苗图汇考》的长处在于,它不是孤立地以具体某个民族为研究单元,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整合相关的文化信息,去观察贵州并存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使得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得以揭示,能说清楚异在何处,因何有异;同时使各民族之间文化相同之点也能从中得到揭示。并存文化辐合趋同的深层原因,在于能突破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用文化互动的分析方法去把握并存民族文化的相互调适作用,乃是本书的又一长处。尽管这一分析还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肯定起到了丰富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作用。

民族文化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的稳定延续是众多自然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研究这些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学科,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中往往不相统属,甚至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经常都会遇到诸多的障碍或误解,以至于传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办法,往往较多地关注物质形态和定型制度的成因,而忽略了对其他方面的探讨,尤其是对精神层面的探讨。《百苗图汇考》并没有照搬西方学者的分析惯例,而是立足于中华文献传承的共同特点,有效地借用和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资料与方法。该书在诠释业已消失或高度变形的古代文化事实时,成功地借助了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乃至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资料和方法,从而使诠释工作既令人信服,又符合文化结构的自身逻辑,这是该书最难能可贵之处。该书的这一尝试,同样有助于历史人类学研究办法的健全与完善。该书对衣着习俗、饮食

习惯以及各民族自称和他称的考订,无一不贯彻了这一研究办法。殷切地希望这一研究办法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使之进一步完善。

总之,《百苗图汇考》是一本可读性较高、研究功力不薄的成功之作。尽管本书提出的研究方法和某些结论尚需进一步完善,但瑕不掩瑜,值得学术界同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鼓励,使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青年一代学人的努力下获得长足进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理想,也是众多年轻一代学人的共同心愿。

是为序。

2002年12月3日于云南大学